

DOI 编码: 10.3969/j. ISSN. 2095 - 4662. 2013. 04. 015

# 新时期以来汪曾祺小说研究述评

魏 雪

(荆楚理工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湖北 荆门 448000)

[摘 要]汪曾祺的小说创作贯穿中国现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新时期小说《受戒》发表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备受文学研究者们的关注。从新时期至今的汪曾祺小说研究有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对这段时期的研究进行梳理是非常有意义的。文章根据新时期以来汪曾祺小说研究的阶段性特点,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对各个阶段研究的特点进行概括。

[关键词]汪曾祺; 小说研究; 新时期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 - 4662(2013)04 - 0060 - 04

## Research Review on Wang Zeng - qi's Novels since the New Period

WEI Xu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Jingc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ngmen Hubei 448000)

[Abstract]Wang zeng - qi's novels run through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circles, especially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new period novel *The Vow*. His novels receive much concern among the literature researchers. The research to his novels since the new period has rich cultural information, 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ake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in this perio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novels in different stages since the new period, the article divides the research into three stages,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tage.

[Key words]Wang Zeng - qi; research on novel; the new period

在新时期文坛复出的作家中,汪曾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创作出《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但是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到了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的一篇《受戒》令新时期的文坛耳目一新,随后发表的《大淖记事》、《异秉》、《岁寒三友》等一系列小说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成为新时期文坛最受评论家关注的热点之一。时至今日,汪曾祺小说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回顾汪曾祺小说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80年代初是汪曾祺小说研究的发端期;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是汪曾祺小说研究的迅速发展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

优秀的研究成果;90年代末至今是汪曾祺小说研究的拓展深化期。汪曾祺的小说研究仍将继续下去,从新的角度对新时期以来汪曾祺小说研究进行阶段性概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发端期

新时期文学伊始,当文坛还在抚摸文革的伤痕、反思文革的罪恶的时候,汪曾祺却以全新的创作风格于1980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受戒》,旋即引起文坛的关注。对汪曾祺小说的研究“以1980年唐挚的《赞〈受戒〉》、张同吾的《写吧,为了心灵》为发端”<sup>[1]</sup>。1981年,汪曾祺短篇小说《大淖记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随后,凌宇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是诗?

[收稿日期]2013 - 04 - 22

[作者简介]魏雪(1983—),女,湖北荆门人,讲师,硕士。

是画?》一文对《大淖纪事》进行评论。凌宇认为:“诗画里有的东西它有,诗画里没有的东西它也有。它不是一曲战歌,却非软性音乐;它真是一幅水彩,却不失于纤弱,秀丽其衣,健美其质。”同时也指出小说存在“大淖的风气里毕竟混杂着渣滓”、“作者的态度终究太过客观”等缺点<sup>[2]</sup>。1982年程德培的评论文章《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认为,汪曾祺的作品给读者带来了“重温世界的美感”,他将汪曾祺的作品与沈从文、孙犁的作品联系起来,肯定了汪曾祺小说艺术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不足的地方”,“诸如:应该更多地去表现时代的‘风云’,而不应该太多地注意‘风情’;应更多地去写时代的英雄,揭示社会的重大问题等等”<sup>[3]</sup>。张炯在《一九八一年的中国文学》一文中,将汪曾祺归为“乡土派”<sup>[4]</sup>。刘锡诚将汪曾祺的作品分为3类:“第一类,写的是塞上生活场景”;“第二类是取材于较近的或当前的现实生活的”;“第三类作品,是描写城镇市民生活场景的小说”。他同时指出“《受戒》一类作品所写的是另一种情况。它肯定和赞美合乎人的天性的人性和纯洁朴素的友情。”<sup>[5]</sup>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季红真从汪曾祺小说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入手对汪曾祺的小说进行评论,并且针对一些否定汪曾祺作品时代性的现象,为汪曾祺进行辩护,“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历史道路,对现实的感受与认识也各不相同,无论是人生态度还是审美趣味,都必然会有明显的差异,不必硬性划一,也无需彼此苛求。”<sup>[6]</sup>黄子平认为,汪曾祺的小说继承了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对其小说创作进行了肯定<sup>[7]</sup>。丁帆则认为,汪曾祺的小说“是风俗画的佳作”<sup>[8]</sup>。行人在《他耕耘在真善美的土地上》一文中,对汪曾祺的创作进行概述,认为“在风格特色上,汪曾祺的小说比较接近散文,是散文化的小小说”。但是行人也指出,汪曾祺“早期的创作曾经受过老庄‘清静无为’思想的影响,以及在文学探索过程中存在单纯追求形式新奇而破坏了艺术完整上的失误,就是在近期作品中也有一些并不成功的败笔与次品”<sup>[9]</sup>。这一阶段的文学评论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进行了初步肯定,但很多评论家受到当时文学思潮的影响,对汪曾祺小说的内涵风格进行评论限于新时期文学开始时的现实主义风格,文学观念还没有全面开放,对汪曾祺小说的认识不够深入和全面,研究工作有待于进一步展开。

## 二、迅速发展期

20世纪80年代中期,汪曾祺的小说“行情看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学者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其与鲁迅、郁达夫、废名、沈从文等优秀作家的小说一样,是“自觉地打

通诗、散文、政论、哲理与小说的界限的一种现代意识”,使抒情小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sup>[10]</sup>。汪曾祺小说研究的优秀成果开始大量出现。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研究者们主要对汪曾祺小说的文体特点与审美风格、哲学思想与艺术渊源,以及小说在当代文坛的地位、影响作出分析评论,同时还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进行了比较研究。使汪曾祺小说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

关于汪曾祺小说的文体特点与审美风格,评论家们认为,其小说具有散文化、诗化的特征。曹文轩认为,汪曾祺的小说“情节淡化”、“情感淡化”<sup>[11]</sup>。储福金与何立伟对话时说“汪曾祺的小说,散文的味儿很浓的。”何立伟则对汪曾祺小说的语言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语言文字到了这种化境,看不出斧斤的凿痕,看不出匠意,还有什么好说的?”<sup>[12]</sup>著名作家王蒙对汪曾祺小说的语言是这样评论的:“他的语言是一种很有火候的、带有闲适和恬淡意味又常是半文半白的一种语言。”<sup>[13]</sup>在文体方面,吴秉杰认为“汪曾祺的创作在小说文体形式的革新中也开风气之先,他描写市井细民和下层知识分子,表现传统生活方式中健康的生命活力和朴素的文化形态,因而散淡平易的语言中便倾注了对世俗大众的关切。”<sup>[14]</sup>李国涛认为,评论汪曾祺小说时应注意3点:“一,‘小说是回忆’。二,‘近似随笔’。三,‘写小说,就是写语言’。”<sup>[15]</sup>徐自强则将汪曾祺的“散文诗体小说”概括出“三味”:“乡土味”、“冲淡味”、“诗味”<sup>[16]</sup>。有的评论家认为“汪曾祺把对风情、习俗、轶闻、掌故的铺叙和渲染,视为小说内容的支柱和骨架”,怀疑“气氛即人物”,指出“小说中的气氛只能是一种手段,与气氛相比,人物才是目的。”<sup>[17]</sup>丁茂远指出,汪曾祺的小说《晚饭花》、《故里三陈》、《塞下人物记》是“笔记体小说”<sup>[18]</sup>。还有评论者分析汪曾祺小说的结构,认为《安乐居》、《岁寒三友》、《故里三陈》是人像展览式小说的佳作<sup>[19]</sup>。孙郁在文章《汪曾祺的魅力》中开篇即说“第一次读汪曾祺的作品时,我就曾惊异地叹道:原来作品也可以这样写!”他认为“汪曾祺也把散文的笔法用到了小说的创作中”<sup>[20]</sup>。邓嗣明“就‘氛围气’的这两种表现形态对汪曾祺小说的抒情审美品格作些剖析”,从“‘气氛即人物’:审美感受的物质外化”、“小说‘散文化’:理想人格美的塑造”分析汪曾祺小说的艺术品格<sup>[21]</sup>。石杰指出,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生命是“和谐”,适应这和谐的是“艺术表现上的乐感精神,意重于技和平淡”<sup>[22]</sup>。

关于汪曾祺小说的哲学思想和艺术渊源的研究,文学评论界认为,汪曾祺小说中体现了儒、道、佛思想,他的小说创作既来源于传统文化,也汲取了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手法。季红真认为,汪曾祺小说创作的

“精神母体是中国的传统文化”<sup>[23]</sup>。费振钟指出:“汪曾祺小说‘散文化’却正是东方(中国)古典散文理论移植的成功尝试。”<sup>[24]</sup>李国涛在《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一文中指出,汪曾祺小说的随笔写法与现代国外的“非小说”类似。王干认为“汪曾祺深得归有光的余韵,文体清新温润典丽”<sup>[25]</sup>。钱理群和吴晓东指出“汪曾祺是较早意识到把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小说家。”<sup>[26]</sup>

这一阶段还有很多文学评论者对汪曾祺小说创作进行了比较研究,对其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评价。黄子平将汪曾祺的小说定位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主要是所谓‘寻根文学’——与四十年代新文学,与现代派文学的一个‘中介’”<sup>[27]</sup>。李陀将汪曾祺小说中的意象与韩少功、阿城、何立伟、贾平凹、郑万隆、莫言等作家的作品中创作的意象进行比较,认为汪曾祺小说在美学上的特征“无疑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后来者”<sup>[28]</sup>。李洁非与张陵则将汪曾祺的小说与林斤澜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两个作家的小说在“语言形式上自觉地营造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sup>[29]</sup>。还有的评论者将邓友梅、陆文夫与汪曾祺并提,因为他们“是当代文学中第一辈有意识的文化小说家”<sup>[30]</sup>。评论者们还将汪曾祺作为“京派最后一个作家”<sup>[31]</sup>进行研究,指出汪曾祺师承沈从文的小说创作风格,但也指出两者有不同之处:“沈从文通过湘西风土人情美的动人描述来衬托都市生活的肮脏,但汪曾祺却把市民社会生活也表现得很美。”<sup>[32]</sup>严家炎总结京派文学的总体特征,将汪曾祺放在京派作家中进行研究,认为汪曾祺“颇得废名与沈从文两家的长处”<sup>[33]</sup>。杨义也将汪曾祺放入京派作家中,与废名、沈从文同时进行研究。这一阶段,研究者们还指出汪曾祺是乡土派的作家。丁帆认为“直到新时期,老作家汪曾祺才又重新恢复了这种‘乡土小说’的风格。”“八十年代‘乡土小说’重新崛起,从汪曾祺的创作开始,‘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又回到了‘乡土小说’的本体之中。”<sup>[34]</sup>丁帆也指出“汪曾祺继承了沈从文和‘京派’小说的衣钵,为恢复小说的浪漫诗意而再开新时期田园小说的先河”<sup>[35]</sup>。

这一时期,汪曾祺小说研究全面展开,大量研究成果的出现使汪曾祺小说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并为下一阶段研究的深化拓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 三、拓展深化期

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文学评论界在延续上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对汪曾祺小说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取得了一些成果。评论者们从新的角度拓展了汪曾祺小说的研究,用新的理论进一步深化研究。但是相比较上一阶段,这一时期汪曾祺小说研究的优秀成

果相对较少。

研究者们对汪曾祺小说的文体特征和审美意识、现代意识和精神内涵进一步进行研究,同时继续将汪曾祺小说纳入京派小说和乡土小说,在汪曾祺小说比较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创新。格非在《文体与意识形态》一文中,将汪曾祺与废名、沈从文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自己新的观点,他认为“汪曾祺的小说可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小说。”“汪曾祺既没有废名的偏执,也没有沈从文的火气,而是处处显示出对虚构、想象、记忆中闲适生活的向往与自足。”格非认为,在汪曾祺、沈从文、废名三者之中,“沈从文最不讲求文法”,“汪曾祺最讲求文法”,“废名介乎他们二人之间”<sup>[36]</sup>。格非还从新的角度研究汪曾祺小说,认为“汪曾祺是先锋文学一个真正的源头”<sup>[37]</sup>。翟业军从汪曾祺的“沈从文论”的症候出发,从新的角度对汪曾祺和沈从文创作进行了比较<sup>[38]</sup>。刘明从汪曾祺与五四新文化传统的角度入手,研究汪曾祺文化意识构成及其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我们可以大抵看到源于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等人的‘文学的启蒙’传统,在多年衰微之后,经由汪曾祺接力式的承继,又在新时期小说格局中得以复苏。”他认为,汪曾祺的创作“实现了民族文化传统与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双重继承与融合。”<sup>[39]</sup>刘明认为,汪曾祺的小说追求的是“真实”与“和谐”,他在前人研究汪曾祺小说“和谐”的基础上提出“真实”的观念,将“真实”与“和谐”统一起来<sup>[40]</sup>对汪曾祺小说创作进行研究。季红真总结了汪曾祺对于中国小说的积极意义。肖莉探讨“回忆”机制对汪曾祺小说文体诗意建构的影响,指出“氛围浸透了人物,氛围体现人物的精神风貌,氛围投射人物的人生际遇。”<sup>[41]</sup>王一川将京味文学分成三代,将汪曾祺与林斤澜、邓友梅、韩少功、陈建功等一起列为“第二代”<sup>[42]</sup>。林斤澜谈到汪曾祺小说时说,“‘散’自有他的‘散法’”,“此‘散法’我曾戏寻‘规矩’:‘明珠暗线’一也,‘打碎重整’二也”<sup>[43]</sup>。时任中国作协主席的铁凝在2007年5月18日纪念汪曾祺研讨会上说:“他的文学是要带给人温暖的,并且这温暖不是轰轰烈烈的‘大热’,是‘小温’。”此话形象的概括了汪曾祺小说创作的特点。

总而言之,综观汪曾祺小说研究的3个阶段,新时期以来,研究者们从多角度、多层次对汪曾祺的小说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仍然有进一步展开研究的空间,如,对汪曾祺建国之前创作的小说在研究中可以给予更多的关注。还有,国内的研究者对于汪曾祺小说创作风格成因大多偏重在传统文化渊源方面,汪曾祺的创作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吸收了国外的文学创作手法,国内的研究者在以后的研究中

可以对这方面进一步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 参 考 文 献

- [1] 邵宇. 汪曾祺研究概况[J]. 社科信息(南京), 1992(8): 46-48.
- [2] 凌宇. 是诗? 是画? [J]. 读书, 1981(11): 42-47.
- [3] 程德培.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J]. 上海文学, 1982(2): 86-89.
- [4] 张炯. 一九八一年的中国文学[J]. 作品与争鸣, 1982(9): 71-79.
- [5] 刘锡诚. 试论汪曾祺小说的美学追求[J].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3(3): 10-17.
- [6] 季红真. 汪曾祺小说中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J]. 读书, 1983(12): 15-20.
- [7] 黄子平. 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J]. 文学评论, 1984(5): 22-32.
- [8] 汪曾祺, 吴调公, 章品镇等. 谈谈风俗画[J]. 钟山, 1984(3): 213-229.
- [9] 行人. 他耕耘在真善美的土地上[J]. 当代作家评论, 1984(1): 43-54.
- [10] 黄子平, 陈平原, 钱理群.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J]. 文学评论, 1985(5): 3-15.
- [11] 曹文轩. 淡化趋势——试析一种新的文学现象[J]. 百家, 1986(1): 17-25.
- [12] 储福金, 何立伟. 关于文学语言的对话[J]. 钟山, 1987(5): 198-202.
- [13] 王蒙. 新时期文学面面观[J]. 芙蓉, 1993(3): 165-174.
- [14] 张学昕. 近年来小说创作文体变化散论[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0(6): 58-61.
- [15] 李国涛. 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J]. 文学评论, 1987(4): 56-64.
- [16] 徐自强. 淡中有味, 飘而不散[J]. 文艺理论与批评, 1988(4): 120-127.
- [17] 马风. 从文学社会学角度看汪曾祺小说[J]. 当代作家评论, 1989(5): 68-74.
- [18] 丁茂远. 论新时期小说文体自觉意识[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0(8): 104-110, 31.
- [19] 陈文忠, 丁胜如. 人像展览: 短篇小说的第三种结构[J]. 文艺研究, 1990(6): 56-62.
- [20] 孙郁. 汪曾祺的魅力[J]. 当代作家评论, 1990(6): 65-69.
- [21] 邓嗣明. 弥漫着氛围气的抒情美文——论汪曾祺小说的艺术品格[J]. 文学评论, 1992(3): 118-124, 129.
- [22] 翁之秋, 蔡跃锐. 让生活淹没一切悲和喜——评汪曾祺小说的叙述风度[J]. 文艺争鸣, 1992(3): 26-30.
- [23] 季红真. 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下)——论新时期小说的基本主题[J]. 中国社会科学, 1985(4): 151-172.
- [24] 费振钟. 时空的幻景——新时期小说的艺术蜕变侧面研究[J]. 文学探索, 1987(1): 1-9.
- [25] 王干. 寻求超越: 小说文体实验[J]. 小说评论, 1987(5): 57-63.
- [26] 钱理群, 吴晓东. 文学的归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略》之五[J].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1): 64-70.
- [27] 黄子平. 汪曾祺的意义[J]. 作品与争鸣, 1989(5): 48-53.
- [28] 李陀. 意象的激流[J]. 文艺研究, 1986(3): 52-55.
- [29] 李洁非, 张陵. 矮凳桥文体[J]. 当代作家评论, 1987(6): 42-48.
- [30] 徐剑艺. 当代文化小说的南北先驱[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8(1): 19-25.
- [31] 严家炎.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 [32] 刘再复. 近十年的中国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J]. 人民文学, 1988(2): 115-128.
- [33] 严家炎. 论京派小说的风貌和特征[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4): 1-11.
- [34] 丁帆. 五四以来“乡土小说”的阐定与蜕变[J]. 学术研究, 1992(5): 107-111.
- [35] 丁帆. 乡土小说: 多元化之下的危机[J]. 山西文学, 1996(11): 64-69.
- [36] 格非. 文体与意识形态[J]. 当代作家评论, 2001(5): 8-10.
- [37] 格非, 李建立. 文学史研究视野中的先锋小说[J]. 南方文坛, 2007(1): 83-88.
- [38] 翟业军. 蔼然仁者辨——沈从文与汪曾祺比较[J]. 文学评论, 2004(1): 30-38.
- [39] 刘明. 汪曾祺与五四新文化传统[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2): 79-85.
- [40] 刘明. “规避”的辉煌和遗憾——汪曾祺创作论[J]. 当代作家评论, 2003(6): 80-86.
- [41] 肖莉. 回忆和氛围: 汪曾祺小说文体的诗意建构[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2): 65-69.
- [42] 王一川. 京味文学: 绝响中换味[J]. 北京社会科学, 2006(6): 3-6.
- [43] 林斤澜. 论短篇小说[J]. 当代作家评论, 2007(1): 4-11.

(责任编辑 尹春霞)